

论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字理臆说^①

杨雪丽^②

[摘要] 根据字源或参考字源,从汉字部件的职能及组合方式中分析出造字意图,是谓汉字的结构理据,简称字理。在对外汉字教学领域,如果无视汉字部件的客观职能,而是视大多数部件甚至笔画都具有“表意”功能,并把主观想象的“意义”赋予它们,从而附会出字符的某一项语素义,本文称之为“字理臆说”。这种行为早已有之,且名称各异。但由于对外汉字教学不同于其它,所以这种方法应该慎用。

[关键词] 形义关系;字理;臆说

On the “Conjecture of Structure Motiva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Yang Xuel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ord sour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 the reference of the source, previous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intention of character formation from the character component—this is called the structure motiv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if we ignore the object function of character components while analyzing the intention of character building, but treat most components, even the strokes as meaningful parts and give a subjective meaning to them in order to create a meaning to the morphemes, the present author thus calls this kind of method “subjective analysis of structure motivation.” This method has been existing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different names. But it should rarely be us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meaning; structure motivation; conjecture

一、引言

外国人初学汉字多有畏惧之感。为了提高他们的兴趣,也为了培养他们汉字构形的

① 本文是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资助项目“e-时代的对外汉语分级教材”的成果之一。

② 作者简介:杨雪丽,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系统意识,在初学阶段教授者一般都会向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成字部件(也称构件)及其字源,如日、月、山、水、口、目、手、心等。之后,随着学习者所掌握的字符数量的增加,再逐步引导他们科学地分析字形结构并根据构件的客观职能“关联”字符所表达的读音和意义,以帮助学习者建立汉字构形的基本概念,加速提高识字水平。亦即“利用汉字形义统一的原则,加强对字理的讲解,使识字教学逐步理性化”(王宁,2002b)。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字理识字法”。

但不尽人意的是,许多现代汉字的字理并不明显,有的还十分隐晦,需要追根溯源、旁征博引地“考证”方可得知。这种溯源法在传统汉字教学与研究中经常使用且效果良好,但在对外汉字教学领域,让一般的学习者借助“考据”法获悉字理来掌握汉字,显然不切实际;可是,“字理识字法”又的确为外国学习者喜闻乐见。于是,一种不完全按照字理讲解汉字形义关系的方法便出现在了对外汉字教学课堂。该方法视绝大多数汉字为会意结构,分析形义关系时基本不理睬汉字构件的客观职能,而是一味地把主观联想的“意义”赋给汉字构件,从而附会出讲解者所需要的词义或语素义。例如:

(1) 我:手旁意味劳动,戈为武器,用以为自卫,保护自身安全。

(2) 国(國):大口为国境线。小口为国境线里的人口。戈为武器,对外抵御侵略,对内维持治安。所以,“戈”部署在国境线和人口之间。“二”表示只有民众团结一心,才能保国(大口)卫民(小口)(季素彩,2003a)。

(3) 裕:从衣从谷,便可理解为“丰衣足食”。

(4) 海:从水从每,便可理解为“海很大,每个地方都是水”(常微,2006)。

对于这种迥异于正统的释字方法,人们的看法不同、态度不同,甚至连使用的称谓都不尽相同。常见的如“新说文解字”(殷焕先,1981)、“俗形义学”(李万福,1995)、“流俗文字学”(王宁,1997)、“俗说文解字”(季素彩,2003a)、“俗文字学”(季素彩,2003b)等等。在此,本文不多讨论这种方法是否适用或者如何施用的问题,只想就其所使用的名称,以及这种方法之所以在对外汉字教学领域广为流行的原因谈些个人看法。

二、界定名称的必要性

在对外汉字教学与研究领域,可能是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名词术语指称不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厘清术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从古到今,不按照字理讲解字形结构的方法几乎被人们应用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对外汉字教学领域,人们争论比较多的是这种方法能否使用、如何使用,至于用什么名词来称谓它,大家似乎各随己愿、少有计较的。对此,笔者却不以为然,略陈己见,以请教方家。

首先如“俗文字学”、“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意谓说解文字。下同,笔者按)”之类。这类名称可以有两解:一是“俗”的“文字学”、“俗”的“说文解字”;二是“俗文字”之“学”、“俗说文解字”之(“学”)。先讨论第一种,根据一些学人的解释,“俗”指“非(正)常”之义,是用以区别“正常”的“文字学”、“正常”的“说文解字”的。也就是说,“所谓‘正’是指严格按汉字学理论进行教学,如强调汉字的理据性、汉字构造的规律、书写笔顺等;所谓‘俗’是指从

‘俗汉字学’出发,灵活解释与拆分汉字,便于留学生识记和书写汉字”(常微,2006)。亦即:“如果用现代诠释学的原理来说解汉字,正常说解(如《说文解字》)当属前者(指信仰的诠释学。笔者按),超常或非常说解当属后者(指怀疑的诠释学。笔者按)。这里所谓超常或非常说解,即用俗文字学的诠释原则解拆汉字,称其为‘俗说文解字’”(季素彩,2003)。笔者以为,用“俗”表示“非正常”或“超常”问题不大,将“俗”与“正”相对而言也可以商讨,但是,仅凭一种“非正常”或“超常”的释字法就能够撑起一门“某某之学”吗?

“俗”文字学既然是相对于“正”文字学而提出的,那么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正”的文字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对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结构类型及形音义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以《说文解字》及‘六书’理论为核心,形体研究与音义研究紧密结合”(沙宗元,2008)。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字学”。该学科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形成汉字构形学、汉字字体学、汉字字源学、汉字文化学等四个方面的分支(王宁,2002)。请问:所谓“俗”文字学、“俗”说文解字除了把字符当会意结构讲解、把主观联想义赋予汉字构件外,还有什么理论或方法?其全部内容不过是“超常解释汉字形义关系”而已。既然如此,何必非要冠以“某文字学”的大名呢?类似的情况还有“流俗文字学”、“新说文解字”等。这类名称的问题,绝不是加一个修饰语那么简单。

如果把“俗文字学”、“俗说文解字”理解为“俗文字”之“学”或“俗说文解字”之(“学”),歧义就更大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俗文字学”早已有之,但其所指并非这种“超常”的释字法,而是指以“俗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陈五云,1990;张涌泉,1996),是汉字学下属的一个分支。“俗文字”又称“俗体字”、“俗体”、“俗字”等,“它相对于‘正体字’而言,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不符合一定历史时期通行规范的俗写汉字”(沙宗元,2008)。把研究“俗文字”的学科称为“俗文字学”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名正言顺。就像词汇学领域把研究“俗词源”的学科称作“俗词源^①学”一样。以此类推,如果真有“俗说文解字”之(“学”)的话,其研究对象也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俗解汉字的方法及其目的,如字谜、测字术等,而非文字学意义上的字形分析。“俗文字学”既然早有所指;“俗说文解字”又让人联想到流行已久的“字谜”、“测字术”。所以笔者认为,对外汉字教学领域所用的那种不按照字理讲解形义关系的方法,还是避免使用“俗文字学”、“俗说文解字”之类的名称为好。

这里需要讨论的还有“俗形义学”这一称谓。“形义学”是汉字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要抓住汉字因语素的意义而构形的特点,总结出汉字形义统一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达到确定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这一目的”(王宁,2002a),是一门“较为客观地探求汉字形义关系的学科”(李万福,1995)。按照李万福(1995)的界定,“俗形义学”是相对于“形义学”而言的,它“把多数汉字视为会意字”,往往

① 所谓“俗词源”,是指当人们不明白一个词为什么这么叫时,就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如“望洋兴叹”里的“望洋”本是不能拆开解释的联绵词,指“仰视的样子”,却被后人误解为“望着海洋”;“心宽体胖”中的“体胖”本指“身体自然安泰”,却被误解为“身体肥胖”。参见张绍麟《汉语流俗词源研究》。

“较为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如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止戈为武”^①、“自环者为之厶(私)、背私为公”^②,宋人王圣美的“右文说”、王安石的《字说》、现代人安子介的“劈文切字”,以及长期流行于民间的字讖、字谜、测字术等,都属于“俗形义学”的范畴。

我们可以把有别于传统“六书”理论的其他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视为“另类”。但是,若将它们都归为“俗形义学”之列,笔者不敢苟同,原因如下。

根据功用,诸多的“另类”说解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不以探究客观的形义关系为目的,此类解说全凭需要。“止戈为武”、“自环者为之厶(私)、背私为公”,字讖、字谜、测字术等都是;二是仍以探究客观的形义关系为目的,只是方法与“六书”不同,于汉字研究亦有一定的贡献。如“右文说”、“劈文切字”理论等。两者相比,前者看似在分析字形结构,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者的目的是借字形为自己找托词、找借口,听者也未必当真。因此,其对字形的分析是否符合构形规律、释字的方法是否科学也就无关紧要。所以这类说解“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的特点十分突出。又因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汉字结构本身,此类解说即使谬误,但对人们正确了解汉字不会造成负面影响。把这类内容归为“俗形义学”没有任何问题。而后者则不同,这类分析字形结构的方法虽然有别于“六书”传统,解说也稍显牵强,但绝不是“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如“右文说”,通过对一部分汉字的归纳,发现了位于字符右边的“声符”同时也表“意义”的现象;“劈文切字”理论总结归纳的汉字更多。它们的目的都在探索并揭示汉字的形义关系,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这类内容不应该归入“俗形义学”之列。

目前,在对外汉字教学领域流行的这种不按照字理讲解汉字形义关系的方法,虽然也具有明显的“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这一特点,但笔者仍不同意将其归入“俗形义学”之列,因为它最终不可能像“俗形义学”那样,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汉字的形义关系,它必须有所限制,必须有所规范。教师之所以乐意“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归根结底是想借助对字形的“有趣”分析,达到让学习者掌握汉字的目的。但是问题是,由于外国学习者的水平有限,对于教师的讲解,他们分辨不出哪些是汉字的客观规律、哪些只是教师的“插科打诨”,其结果可能是统统信以为真。因此,教师在讲解汉字的形义关系时,如果不考虑汉字本身的系统性,随心所欲地联想,就会不可避免地扰乱学习者对汉字构形规律的认识。例如,“韭菜的‘韭’,像一把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长在地面上……但是,有些人因为‘韭’的上部与非常的‘非’外形一样,硬把它讲成‘不是(非)只有一根,而是一大片’;把‘悲’讲成‘心里像长了韭菜一样悲哀’……照此讲下去,‘排’岂不是变成‘手拿韭菜’,‘绯’岂不是变成‘丝捆韭菜’”(王宁,1997)?对此,许多学者指出,这种方法非常需要一个“科学、合理、适当的限度和规范”(张德鑫,1999),否则就会出现“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混乱。目

① “止戈为武”:“武”为会意字,“止”表示行走,“戈”表示武器,合起来表示“战争”、“武力”。《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大胜晋军后,大臣提议耀武以扬威。楚庄王以“止戈为武”为理由,表示了自己“止息干戈”的意思。

② “自环者为之厶(私)、背私为公”:“厶”,是“私”的本字,指一种农具。“自私”是其后起义。“厶”并非为“自私”义而造。(参见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中华书局2007版,第159页)

前虽然还没有相应的规则出台,但不能因为这种方法具有“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的特点,就将它归入“俗形义学”。

综上所述,主观分析汉字形义关系本应该是一种和汉字教学无关的行为。但是,由于一些现代汉字理据不明或理据消失的特点,而“字理识字法”又的确可以帮助外国学习者掌握汉字,于是有些教师就采用临时“编造”汉字理据的方法“帮助”学生记忆汉字。这种“编造”其实就是一种“臆说”。所以笔者建议,为了和其他目的的“主观讲解汉字形义关系”的行为有所区别,不如把这种为了教授汉字而“编造”字理的行为称为“字理臆说”。

三、字理臆说存在的原因

字理臆说在当今的对外汉字教学领域之所以“大放异彩”,应该说既有汉字本身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教师方面的主观因素。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或者说是语言的载体,因此文字的构形一定和它所承载的语言有着某种关系,也就是说,文字构形的依据来自语言。以大家较为熟悉的汉字和英文为例,作为世界上两大不同性质的文字,它们的构形依据很不一样。英文模写的是言语中的声音,字母与其所记录的声音之间呈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学习者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拼合规则,会说英语就意味着会写英文;看到英文也基本能读出英语;汉字却不然,汉字的字形结构更多的是和它所表达的意义有关系,与其所记录的词或词素的声音没有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所谓的表音构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用来区别意义的一种辅助手段,加上古今语音系统的变化,现代汉字中有许多表音构件的表音极不准确。因此,对于学习者来说,会说汉语和能够认读汉字几乎是两回事。再加上汉字的书写问题,这些是汉字难学的客观原因。外国人学习汉语,无论是先语后文,还是语文并进,汉字学习都是需要下大工夫的。

先语后文的学习者,如一些华侨子弟,因为家庭的影响,用汉语交流可能已不成问题了,但一旦涉及汉字就如临大敌。语文并进的学习者就更痛苦了。如果说先语后文的学习者学习汉字只需要“两结合”,那么语文并进的学习者学习汉字差不多就是“三结合”了。因为,先语后文者学习汉字时,由于已经会说,学习汉字主要是要在大脑中建立起音节和字符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语文并进者则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学习如何说,在大脑中搭建音节和意义间的关系;同时又要记忆字符,在大脑中建立字符和音节间的关系。

当然,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汉字字符在表音方面的确很不给力,但在表达词义或词素义方面却很有优势。如上文所言,汉字字符在构形上的主要依据不是语音,而是意义。因此,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虽然一样努力地要把字符与它所记录的语素的音、义联系起来,但结果却有二种:记住一个字符的读音不太容易,但记住一个字符的意义似乎不难。留学生“对于学过的汉字,容易忘记的是字形和字音,不容易忘记的是字义”(周健,1998)。这当然有汉字表意性强的原因,但和教师的引导也不无关系。

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最初的学习是机械的、零散的。但随着掌握的个体字符数

量的增加,学习者会首先感觉到汉字形体与其所记录的词素义之间存在着的“象形”、“表意”之类的关系,如“日”、“月”、“山”、“水”之类的独体字,以及“明”、“林”、“休”、“臭”之类的会意字。在此阶段,教授者往往非常乐意告知学生一些古人造字的“趣事”,如“太阳”是圆的,就画个圆圈,里面点一黑点表示实心;“月亮”缺时居多,就画成月牙形的等等。于是,不知是因为“象形”、“会意”字让人易学难忘;还是由于其他结构的字讲解起来太过复杂;抑或一些教师对现代汉字中一些构件的客观职能本来就不甚清楚,又不愿花精力去了解;再加上大多学习者都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想象力比较丰富。于是,很多教师在讲解汉字时就扬长避短,竭力宣传字符构件的表意功能;不说或少说构件的示音功能和标示功能。对于字理明显的字,尤其是会意结构的字,有时还能予以客观的讲解;对于那些非会意结构的字,或者需要推源才可以得知字理的字,就打着“为学生着想”的借口,联系学生熟悉的事物,夸大或编造汉字构件的表意功能,把非“象形”、“会意”结构的字形象地“杜撰”为“象形”、“会意”结构,绞尽脑汁也要附会出字符所表达的语素义,以“帮助学生识记汉字”。这可能就是“字理臆说”存在的主观原因。

当然,“字理臆说”如果用得合适,应该可以弥补一些现代汉字字理不明的缺憾;但如果用得不好,也有可能消减“字理识字法”的功效。

参考文献:

- [1] 常微. 2006. 从对外汉字教学现状看“正”“俗”两派教学法的应用与融合. 语文学刊, (8).
- [2] 陈五云. 1990. 俗文字学刍议.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
- [3] 季素彩. 2003a. “道可道, 非常道”——试论“俗说文解字”的若干问题. 汉字文化, (2).
- [4] 季素彩. 2003b. “俗文字学”诠释方法略论. 汉字文化, (4).
- [5] 李万福. 1995. 谈俗形义学. 汉字文化, (1).
- [6] 李万福. 1997. 传统形义学说菁华述评. 汉字文化, (3).
- [7] 李香平. 2006. 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新说文解字”.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 [8] 刘德鑫. 1999. 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 世界汉语教学, (1).
- [9] 沙宗元. 2008. 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10] 唐生周. 2001. 以形说义略论. 江西社会科学(文学与语言), (5).
- [11] 王宁. 1997. 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 语文建设, (3).
- [12] 王宁. 2002a. 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上). 课程·教材·教法, (10).
- [13] 王宁. 2002b. 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下). 课程·教材·教法, (11).
- [14] 王宁. 2002. 汉字构形学讲座(第2版).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 [15] 殷焕先. 1981. 汉字三论. 济南: 齐鲁书社.
- [16] 张绍麟. 2000. 汉语流俗词源研究.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17] 张涌泉. 1996. 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2).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9. 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19] 周健. 1998. “汉字难学”的分析与对策. 汉字文化, (2).